



南方是一種建構

(下) ——訪港大榮休教授梁其姿

答——梁其姿 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榮休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
問、文字整理——毛升 歷史學者

(編按: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榮休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梁其姿,長年研究明清社會史和近代社會文化史,近期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南方的想像:環境、身體、疾病、全球化共構下的近世華南》論文集。歷史學者毛升藉此訪問她,由胡適墨寶談到她的治學經歷,以及對「中心」、「邊陲」的看法,上篇刊8月6日本版,本篇為續文)

腳氣病的想像

問:您可否透過一個具體的醫療史個案,分析一下歷史上人們是如何想像南方的?

答:書中第五章,研究近代腳氣病(beriberi)的「出現」與相關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世紀初,在亞洲殖民地工作的西方醫生首次注意到這種陌生的疾病,他們在東南亞、香港、廣州、上海、東京、京都、大阪都發現了這種「新」病。他們觀察當地人一旦得了這種病,男人會腿軟,女人則不育。

在當時遠東熱帶醫學年會上,西方科學家推測,這是吃白米飯引起的營養不良的疾病,如何證明呢?一位西洋醫生就拿白米去餵雞,發現雞吃了之後腿軟,於是得出結論,腳氣病的病因就是吃進太多白米飯。他們之所以把白米與亞洲人的腳氣病的因果關係連起來,是因為亞洲人的主糧是大米,近代以前米糠無法完全被清除,而現代機械科技把大米的糠完全清除後,只吃精白米的亞洲人,因為吸收不到原來米糠裏的維他命B1而患上腳氣。這是西方營養學的重要建構過程。作實驗的醫生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其實,這正反映了西方醫生對南方的一個想像:他們認定這個病是吃米的亞洲人,特別是吃得昂貴精白米的富裕亞洲人特有的病。其實這個解釋並沒有說服當時受過西方醫學訓練的中國醫生,如伍連德。他反對西洋醫生提出的管制白米貿易以防止腳氣病的建議。



毛升(左)與梁其姿(右)訪談。

(黃志東攝)

宋代《嶺南衛生方》對「風毒腳氣」的解釋,則是南方卑下潮濕的環境是主因。中西兩方都對被定義為「南方」的環境下的疾病作出自認為「旁觀者清」的解釋,十分有意思。今天這些想像已不再有效,但肯定今天我們對身體、環境、疾病之間的關係仍存在各種想像與偏見。

問:該個案能說明什麼?

答:近代東西方對於疾病與「南方」或其他環境之間的關係有各種的想像,產生了不同的病因解釋,與不同的治療方式,新的醫療機構應運而生。例如香港在殖民時代初期成立的東華醫院,是殖民政府與在港華商共同推動的管治策略,為了配合香港華人較信賴中醫藥法的傳統。結合中西醫療法的東華醫院是很特殊的殖民體制,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將香港腳氣病人運到廣州去治療。東華醫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香港重要的、具本土特色的醫療機構。所以說,殖民統治者對於南方的各種想像,直接影響他們的管治方式及當地人的日常生活。

南方的商人精神

問:書中也提到很多人參與到了建構南方的想像當中,如病人、醫者、僧侶道士、官員、商人、傳教士、文人等,是互動的結果。

答:是的,但我想強調的是,在中國的南方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是商人。比如,西洋種痘術先是英國商人從歐洲引進廣州,與英商合作的廣州商人在廣州、香港、澳門推動種痘術。善於牟利的商人,頭腦特別靈活。他們把種痘術作為一門生意在廣州迅速推廣。這些廣州商人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吸引民眾。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與廣州醫生把穴位這個中醫的概念納入牛痘技術之中,發展出獨特的種痘方式,配合當地人的就醫習慣與身體觀。這些商人在貯存疫苗的器具上與種痘後的藥物使用上建立了一套程序,類似中國傳統人痘接種的原則。商人也培訓、僱用了本土痘師執行牛痘接種,這些都使得種痘的行業在廣州發展迅速。

問:書中提到,晚清的南方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清代曾實行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廣州曾成為

唯一的通商口岸,是中國人和洋人合法接觸的唯一地點。全球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化立足於地方,需要透過在地過程才得以進行。剛才您提到的中國商人如何利用傳統元素來推廣西方的種痘術,就是很好的例子。書中還有一個例子,是西方傳教士如何用中國元素將外科手術在地化。

答:對,在西醫外科手術還是一種無足輕重且不被中國人承認的新技術之前,早期在華傳教士所開的醫院,為了吸引中國病人,將外科手術的實用性和相關醫療工具都以圖像展現出來,並極力突出其「奇特」性、可觀性、有效性,製造劇場效應,滿足

問:歷史上,這種全球在地化過程為何在廣州尤其有效?

答:這就是邊緣的優勢。所有邊緣,都有較大的自主空間。我用「鞭長莫及」(或山高皇帝遠)來形容南方,中國與西方的政治中心都離此地很遠,就讓這裏的醫生、商人有足夠的空間發展一種獨特的「雜種」地方醫療文化(此處借用中研院雷祥麟教授形容近代中醫為「非驢非馬」的概念,參見《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台北:左岸文化,2024)。正因此,我認為廣州、香港、澳門在歷史上這一流文化相遇中佔據了一個關鍵的位置。本書是從邊緣看中國史,也是關於南方人在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靈巧地尋找出路的過程。

(後記:梁教授的研究室在梅堂(May Hall),是香港的法定古蹟。提起該建築,通常會聯想到作家張愛玲。當年她就讀港大時,曾出入於此。張愛玲是香港的一個文化符號,一篇傳奇,一個有關港人身分認同的想像。我請教梁教授,今天我們又該如何想像南方或香港?她說自己還不曾好好想過,思考片刻後,給出了以下的回答:「其實香港一直是商人精神很旺盛的地方,這是香港自開埠以來的一個特色。商人善於處理實際問題,不會排斥任何有用的想法與做法。他們不會在政治上或其他原則上有太多堅持,主要關心的是如何生存,如何解決現實上的困難,如何最快達到目的。這種隨機應變、順勢而為的處世態度,我姑且稱之為商人精神。我覺得在整個南方,包括香港、廣州、澳門,這種精神普遍存在。」)



《南方的想像:環境、身體、疾病、全球化共構下的近世華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鴉片戰爭後廣州社會人士的好奇心。另外,他們訓練有中醫背景的本地醫生加入,更不排斥廣州方言。我覺得當時的傳教士醫生和廣東當地的商人和醫生都沒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共同把西醫的新技術以一種適合當地人就醫習慣的方式包裝起來,很快地引入華南社會。全球化和在地化是一個共構的過程,而商人又特別靈活,使得過程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社會矛盾。